

杨子怡 著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
比较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 比较研究

杨子怡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杨子怡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12

ISBN 978-7-80752-281-2

I. 韩… II. 杨… III. ①韩愈(768~824)—人物研究
②苏轼(1036~1101)—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7628 号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

杨子怡 著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封面设计 蓝天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5.87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81-2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年度后期资助项目

序

我与子怡虽是忘年，然相知日久，对其学业有一定了解。他好学深思，在追求深厚学养的基础上，志求新见。过去读他的文章和与其交往中已有此感觉。今又读其学术专著《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书稿，不禁掩卷慨叹：叹其读书之多而见解之新。写这部书，不要说退之、东坡二公文本之外的诸多文献需要读，仅就浩瀚的韩、苏两大家诗文集，若要认真阅读，亦非易事。然若不认真读其文本，要想写出这部三四十万字的学术专著，是不容易的，必然因见之不到，难免僻陋。这部书虽以“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的阶段事实为重点，却能以洗练妙笔构建“韩学”、“苏学”的架构，有点有面，使人能全面认识不同时代的两大文化巨擘，使其同与不同的形象活泼泼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对比，是唯物辩证法认识、研究自然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方法。文学研究也是这样。我国古代学者习惯于古今对比，不同风格流派的对比，不同思想范畴的对比；近世能博古通今、贯通中外的大家，则于古今中外的广阔领域进行对比，因而开拓了研究的新天地。子怡的这部专著就是以文化史上韩、苏两位巨擘的同与不同进行比较研究，而构建一部新型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韩、苏本

身无论从思想性格、文学创作、仕途经历、平生遭遇都有许多同异之处，况且从诗文创作分析，苏轼又是继欧阳修之后继承韩愈而自成大家的。

“韩海苏潮”之论，自宋李涂提出后，即有不同看法：或谓韩海苏潮，或谓韩潮苏海。这种潮与海之争，在2006年10月河南孟州“韩愈文化论坛”会上，子怡送给我的书稿《韩海苏潮》，祖美提交的论文《年已近古稀初“识”韩退之》，仍持两种不同意见。子怡在剖析李涂韩海、柳泉、欧澜、苏潮之后，云：“区区四字却区别出四人为文的个性特点，颇有见地。惟以‘海’状韩和以‘潮’形苏，却不甚恰切。韩长于气势浩转，苏长于博大精深，似乎‘韩潮苏海’更好。”又说：“（韩文）冲飙激浪，浑浩流转，如长江大河的气势之美，自然以‘潮’形容更恰切。而至于苏轼所构建的文化世界不仅在于气势，不仅在于文，他在诗、词、书、画、经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领袖群儒，他在其诗文及艺术世界中所渗透出的精神气质及疏狂放达的人格模式亦为文人士大夫所景仰。因此苏轼笔下所营构的文化世界，非大海之广不足以言其‘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吕氏童蒙训》）……因此，‘韩如海’‘苏如潮’遂被‘苏如海’‘韩如潮’所代替。从此，‘苏海韩潮’就成为学界定评。”这也是比较研究客体及客体研究得来的。“韩海苏潮”之说是李涂在他的《文章精义》里提出来的。祖美曰：“《文章精义》一书，在辨识文章源流得失的同时，对韩柳欧苏不同风格的论述与把握颇具卓见。而关于‘苏海’之说，则晚在清代才先后出现的，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又清末人氏所作《〈盛世危言〉跋》亦称‘韩潮苏海’。至于对苏轼诗作编注有‘集成者’之誉的王文诰，以及在其前后的其他人士，也习惯于或称‘苏海’，或称‘韩潮苏海’。笔者深信，这些对李涂称‘韩

如海’、‘苏如潮’的改动，并不是出于对苏、韩有所轩轻的目的，可能性较大的是受上述《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所致。而《总目》对于李涂原文来说，则显然是一种笔误！所以俞樾指出‘然则今人称韩潮苏海，误矣。’（《茶香室丛钞·韩海苏潮》）这是有理有据的，也是很有必要的！……‘韩海苏潮’较之‘韩潮苏海’则更近腴理。”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到郑昌时《韩江见闻录·韩庙苏碑》、《桃花扇·听稗》、《〈盛世危言〉跋》以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苏海识余》，清人多主“苏海韩潮”说。但他们都用旧说。王谓“苏海之说旧矣”的旧说，当源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馆臣写《提要》时，难能见到《永乐大典》所载《文章精义》“韩海苏潮”原文；若见到“韩海苏潮”原文后提出“苏海韩潮”之说，必如子怡阐明理由；不作说明的只此一语，俞樾谓笔误，不无道理；予以纠误，亦很应该。况子怡是从东坡诗、文、词、赋、经、书、画的丰富内涵讲的，不是如李涂仅“是建立在对唐宋，特别是韩、苏文章风格的睿智把握”及文风的推演上。亦如子怡所说：“苏海韩潮还是韩海苏潮？谁‘潮’谁‘海’？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海’‘潮’之称对韩、苏二公毫无轩轻之意，不必为其争短长。”李涂之说重在讲唐宋文的渊源关系和韩、柳、欧、苏文之风格。若以韩愈全部文本包含的内容看，韩亦如苏诗、文、辞、赋、经、书及书论，一至于军事、经济都有理论建树。故后人概之谓韩文“地包海涵”，“博大精深”。这不是海是什么？其实，就韩、苏两大家给我们留下的全部文化财富评断，从其内含的丰富性讲，皆可谓之海。如以李涂论二公文之风格讲，用“雄深雅健”评韩文，而谓之“海”，亦颇恰切。用汹涌澎湃的巨流而成盖地铺天的钱塘江潮，形容苏文之气派风格，也很合适。

韩、苏一生都经历了多次的迁官与贬谪，仕途有顺有逆，顺境者少，逆境者多，平生遭遇挫折无数，几死而生。然他们表现出来的思想情绪却不尽相同：尤其是韩愈潮州之贬、苏轼惠州之谪，同与不同者，子怡书里作了有理有据的详细论述，见解精辟，令人叹服。关于韩贬潮、苏谪惠所表现的思想品格，历来认识不同：自宋人谓韩愈贬潮表现出畏死苦穷及求归的可怜相，影响深远，思想品格多被后世文人批评；苏轼表现出随遇而安、豁达自适的乐观精神，多受后世文人推重。对苏轼寓惠精神的推重是自然的，因为他表现了中国封建文人清廉高雅的品格。韩愈因一封为君为民除弊事的“朝奏”，一下子从刑部侍郎到几于处死、而后贬偏鄙的天涯海角潮州，他虽知上《表》冒险，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故他在委屈里发怨气，在危难中显怯懦。但这只在他离长安的路上和到潮之初。到潮，特别是一入政事后，那种无私无畏、勤政为民的高昂气势，是任何被贬官员无法相比的。千百年来后世尊韩的事实，已经证明韩公光照日月的用世精神为世人效法。韩公性慤，有话直说，不会憋在心里。他畏死苦穷的怯懦，只是一时的思想情绪，勤政为民才是韩公的本质。这有表里之分，怯懦是表，勤政是本。若是否认贬潮有怯懦情绪，是不合事实的为贤者讳；若把这种一时的情绪表现当成韩公的思想实质，而指责韩公的思想品格，那是只见一时表象，而不懂韩公。子怡的研究尊重客观，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个度，论证令人信服。

反过来看苏轼，旷达乐观只是苏轼性格在贬惠时一个方面的表现。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痛苦郁闷，而是在闲官有暇中得到排解。当时，从亲情上，有子迈在身旁；从爱情上，有令他惬意的朝云姑娘。这对一个性格倜傥豁达的文人，已可释解其因降官带来的痛苦和郁闷。况且，此时年过花甲的苏轼，在政途与事业上已无

韩公那种再回朝建立功勋、干一番事业的欲望。事实证明：韩公回京后的二三年里却干出了不朽的业绩。如以晚景心态论，韩愈对长庆三年末的台府之争，朝廷中复杂的权力之争，长庆四年自己病休未能再复官理事时的豁达心态，倒真有点与苏轼贬惠时的豁达乐观心态相似。

在一些士人心里总是羡慕出世的浮屠、道士。那么，在文明社会的发展中，是从佛入道好呢？还是从儒入世好呢？照理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看，还是入世比出世对社会进步有好处。积极用世，才为世用，才能为社会发展添砖添瓦，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才能愈积愈多，社会才能在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的不断积累中前进。如果都入佛不事生产，入道幽居山林，靠别人的劳动果实养活，社会怎么进步？有人会说现在佛、道留下的古刹、典籍，不都保存了丰富的佛、道文化，并且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部分吗？是的。然试想：如果没有广大劳动者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没有那么多能工巧匠能造出来吗？即如那些信佛的统治者，斥财劳民搞佛事，他们本身也还是遵照儒家思想用世和治世的。就拿唐代来说，诏命翻译佛经的官员，不少也是懂梵语的用世者，也未真离官场。封建社会制度上的种种弊端，使许多有用之才不得其用，不得已入佛入道，与山野共始终，与林泉相高洁，表现了与昏庸统治者不相合污的品格。然而，他们并不是故作高洁，不想把自己的才干用于社会，而是不得其能也。有的隐居山林著书立说，研究发明，则是用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正如韩愈所说：“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韩愈全集》卷一六《答崔立之书》）何况，韩公一生都在为才未被世用的有用之才鸣不平呢？

子怡的专著《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不但丰富了韩、苏研究的成果，拓展了韩、苏研究的领域，提出了韩、苏研究的新思维，其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历史文化名人置于地域文化中去审视的新视角，也启发了我们大家思考，推动了韩、苏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的研究。这其中付出的辛劳令我赞叹！

我不长于作序，更难以人微言轻之笔发微知著。仅是以真情实感表达我先读为幸的感受！

张清华

2006年12月24日

于郑州百花书屋

序	张清华 (1)
绪论 从“韩海苏潮”到“韩潮苏海”	(1)
第一章 “诗人例穷苦”: 韩愈、苏轼磨蝎同病	(19)
第一节 “朝为青云士, 暮作白首囚” ——韩愈的磨蝎命运	(22)
第二节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的磨蝎命运	(50)
第二章 “天意遣奔逃”: 韩愈、苏轼南下路线图	(65)
第一节 “天要潮人识孟轲” ——韩愈南下潮州路线图	(67)
第二节 “曾见南迁几个回” ——苏轼南下惠州路线图	(83)
第三章 天意悯斯文: 韩愈在潮州	(98)
第一节 “刺史留衣, 传千秋佳话”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	(101)
第二节 “先生伟绩传青史, 万古民怀逐鳄恩” ——韩愈潮州功绩追寻	(117)
第四章 德不孤者必有邻: 苏轼在惠州	(133)
第一节 “少壮欲及物, 老闲余此心” ——苏轼寓惠期间惠民及物的作为	(136)
第二节 “以彼无限景, 寓我有限年” ——苏轼在惠州的谪居生活	

.....	(149)
第五章 韩愈的罪臣意识与苏轼的避祸心理.....	(182)
第一节 “臣罪幸可哀”: 韩愈忧谗畏讥的罪臣意识	(183)
第二节 “扫除积习不吟诗”: 潇洒东坡的另一副面孔 ...	(200)
第三节 韩愈、苏轼岭海惧祸心理及评价之异探因.....	(213)
第六章 韩愈、苏轼人格意识与文化精神.....	(224)
第一节 “孜孜矻矻”与“行藏在我”的处世意识.....	(226)
第二节 为民请命与惠民安民的民本意识.....	(237)
第三节 刚正执著与君子固穷的养真意识.....	(244)
第七章 韩愈的执儒尊礼与苏轼的好道杂禅.....	(252)
第一节 “平生企仁义”: 韩愈的礼治文化精神	(253)
第二节 出于纵横而杂于禅: 苏轼寓惠思想之变化.....	(272)
第八章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创作比较.....	(294)
第一节 韩愈刺潮诗文之变: 由险趋易, 愤而转哀.....	(295)
第二节 苏轼寓惠诗文之变: 以谪为游, 逍遥山水.....	(322)
第三节 韩愈回归平易却仍存硬语, 苏轼“不屑”为诗而 不无研炼.....	(350)
第九章 日月迭照: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影响比较.....	(363)
第一节 韩愈、苏轼对潮惠地方文化影响比较.....	(364)
第二节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影响之异的文化阐释.....	(381)
第十章 景韩景苏文化中的独特现象: “双忠”信仰与“朝云” 崇拜.....	(400)
第一节 潮州“双忠”信仰与韩愈崇拜之关系.....	(401)
第二节 惠州“朝云”崇拜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430)
附录.....	(469)
参考文献.....	(489)
后记.....	(496)

绪 论 从“韩海苏潮” 到“韩潮苏海”

韩愈、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各自构建出了独特的文化世界，以其博大和深邃奠定了自己在唐、宋文化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至赢得“韩潮”、“苏海”或“韩海”、“苏潮”之称。最早对此评价的是宋人李涂，他在其《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作者用海、泉、澜、潮比喻，说明韩、柳、欧、苏文章的不同风格特征，可谓知音。“海”状韩文浩荡流注之势，“泉”形柳文幽深纤细之美，“澜”描欧文委婉纤徐之姿，“潮”形苏文博大精深之态，区区四字却区别出四人为文的个性特点，颇有见地。惟以“海”状韩和以“潮”形苏，却不甚恰切。韩长于气势浩转，苏长于博大精深，似乎“韩潮苏海”更好。当然，如仅从其文博大汪洋之内容和语言的包容性而言，用“海”来形容韩愈为文之风格，亦无不可，比如明代高棅就曾以汪洋状其博大：“昌黎博大其文，其诗横骛别驱，崑崙崛起，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评汇三》录高棅语）然而韩文特色更突出者在其气势，这方面，前贤评价甚多，如皇甫湜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纤

流不滞。”（《皇甫持正文集》卷一《谕业》）苏洵认为：“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明代的古文家茅坤也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论例）这些论语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韩愈文章气势磅礴的特点。这种冲飙激浪，浑浩流转，如长江大河的气势之美，自然以“潮”形容更为恰切。而至于苏轼所构建的文化世界不仅在于气势，不仅在于文，他在诗、词、赋、书、画、经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领袖群儒，他在其诗文及艺术世界中所渗透出的精神气质及疏狂放达的人格模式亦为文人士大夫所景仰。因此苏轼笔下所营构的文化世界，非大海之广不足以言其“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吕氏童蒙训》），非大海之深不足以言其“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宋孝宗《御制文集序》），因此，“韩如海”“苏如潮”遂被“苏如海”“韩如潮”所代替。从此，“苏海韩潮”就成为学界定评。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曾不满“韩海”“苏潮”的移位，为之正误：“国朝萧墨《经史管窥》引李耆卿《文章精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然则今人称‘韩潮苏海’，误矣。”（《茶香室丛钞·韩海苏潮》）俞氏以李涂的说法为据，指出今人的错误，企图恢复“韩海苏潮”的旧说，然而俞氏白费心机，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苏海韩潮”的说法。清代著名苏诗注释家王文诰，在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完稿后，续有所得，编为五卷，正式以“苏海识余”为标题。他说：“苏海之说旧矣”，以此寓含“汪洋渺弥、横无涯际，观于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从此，后人遂习惯称“苏海韩潮”，杨毓辉《郑观应〈盛世危言〉跋》：“观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直兼乎韩潮苏海，则不啻读《经世文编》焉。”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其传奇剧《桃花扇·听稗》

中说：“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清代嘉庆时海阳（潮安）人郑昌时在其《韩江见闻录》“韩庙苏碑”条中有如下的说法：

苏文如海，韩文如潮。海言所就之宏深，潮言其气之盛大也。韩庙而苏碑之宜哉！人传苏文忠公在惠州作韩文公庙碑之时，沉吟良久，及得“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二语，拍案而起曰：“文成矣！”是为作文争起手法。然篇中议论之精，尤在“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数行。予题碑阴，有句曰：“两代文章配潮海，千秋穷达证天人。”谓此也。

宏深为海，盛大为潮，苏轼以宏深广博见长，韩愈以盛大流注称胜，苏海韩潮，两代文章之极则。韩愈能以精诚“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原因何在，是因为“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同上），所以千秋穷达系乎天而非关人也。苏轼又何尝不是如此，能洞察时政之弊，而不能免于新旧党争之祸；能以诗文鸣世，却不能免于乌台之忧；能恤时悯政，救民水火，却不能自救于贬黄、贬惠、贬儋之灾，于此看来，苏轼也是“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千秋穷达，一证天人，韩公苏公，相似何期乃尔！因此，郑昌时的确是韩、苏二公千载知音，他的“两代文章配潮海，千秋穷达证天人”的联语是对韩、苏二人最恰切的评价。

苏海韩潮还是韩海苏潮？谁“海”谁“潮”其实并不重要，因

为“海”“潮”之称对韩、苏二公毫无轩轻之意，不必为其争短长，上述俞樾的不满和辨正显得多余。韩、苏二公在唐宋文化史上的贡献谁也不敢磨灭，其在唐宋文化史上的地位谁也不可动摇。海涵地负，博大精深，是韩愈文化和东坡文化的共同特点。唯其宏深博大，足以称为“学”。因此建立韩学和苏学近年来成为学界的强烈呼声。比如人们有感于韩愈文化的深刻性、丰富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主张把韩愈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只有这样，才能走近韩潮，探赜韩愈文化世界的壶奥。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论韩愈》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韩学”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韩愈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捩人物”。他在该文中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他并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韩愈的历史文化贡献：

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同时还认为韩愈的这些贡献，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可见，建立“韩学”很有必要。1986年，著名汉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在汕头国际韩愈学术研究会上发表了《宋代潮州之韩学》的演讲，其中说：“宋世崇尚韩文，一如诗家之尊杜，蔚为风气，柳开号‘肩愈’，石介著《尊韩篇》，北方之儒重倡尊王攘夷之说，欧阳修因之作《本论》。

宋世文章，以韩愈为中心，姑名之曰‘韩学’。”饶先生也主张建立韩学，确为有识之见。傅璇琮先生在为张清华《韩愈通论》作序时也说：“因此，我认为，‘韩学’的建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以说适其时也。”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学术界对韩愈地位的尊崇和重视。其实对韩愈的研究从宋代就开始，可视之为“韩学”之开端，历元、明、清至今，虽有盛衰，但从未中断。1998年，河南社科院张清华先生把其出版的专著正式命名为《韩学研究》。

要走近苏海，探赜东坡文化世界之壶奥，有必要建立苏学。对于建立苏学，人们也不乏这方面的建议。早在清代，翁方纲就不止一次地提出“苏学”的概念，“苏学盛于北，景行遗山仰”（《斋中与友论诗》），“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盛于北”（《石州诗话》卷五）。翁氏在这里所说的“苏学”主要是指苏诗在金代广为传播的现象。在金代苏诗之学在文人中广有市场，如金初的朱之才、蔡松年、高宪、卫文仲，金中叶的党怀英、蔡珪、王寂、王庭筠以及金末的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都是苏学的崇拜者和研究者。如高宪称“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中州集》卷五），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卫文仲临终时诵苏轼《赤壁词》而逝（《中州集》卷七），对苏轼何其崇拜。赵秉文称苏轼为“人中麟凤”，称“其诗似李太白，而补之以名理似乐天”（《跋东坡四达斋铭》，《滏水文集》卷二〇）。蔡松年弟子辛弃疾更是把北方苏学带到南宋，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则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批评。纵观有金一代，“苏学”一直贯穿始终，金代文学的得与失都与“苏学”攸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翁氏的“苏学盛于北”确非浪言，合乎有金一代“苏学”的事实。金代的“苏学”尽管局限在苏诗，但实际上成为全面研究苏轼的所谓“苏学”之滥觞。从金历元明清而至今，“苏学”研究长盛不衰，硕果累累。有识之士都看到了正式